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两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唐洲雁 刘本森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号召。这个新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这个新文化的正确路径,就是“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两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根本在于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法论。

1. “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党的100多年历史,既是波澜壮阔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也是成就辉煌的文化建设史、文化繁荣发展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特征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说它是民族的,是指这种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说它是科学的,是指这种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一切

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说它是大众的,是指这种文化主张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此后,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文化形态,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支撑。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回顾党的100多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坚持运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这一重要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

代中国之“的”,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献。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在五干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2. “两个结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人类社会发展曲折起伏,探索现代化之路并非一马平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样的现代化?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作支撑,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等挖掘出来、弘扬开来,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发扬光大;才能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给予中国式现代化持久的力量支撑。正是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力量,让传统

和现代贯通起来,让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两个结合”引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深刻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探求人类未来发展和世界共有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同时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化冲突,以对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面向未来。

进入新时代,正是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展现出应对“两个大局”的智慧和力量。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世界,描绘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图景,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让中华文化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全世界普遍关注,让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得到广泛认同,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彰显出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魅力。

3. “两个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法论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思想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一系列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两个结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必须彰显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坚守科学前进方向。“两个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科学指引。坚持“两个结合”,才能充分激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铸就新的文化形态,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文化支撑,建设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从中凝练出解决世界难题、促进世界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促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更新和成长,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引领世界未来走向,建设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两个结合”指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好坚持“两个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光明。

“两个结合”提供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科学指引,蕴含着诸多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遵循。“两个结合”的本质是坚持守正创新,启示我们要把住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根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两个结合”的要义是坚持思想解放,激励我们要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开辟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空间,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不断推进文化的创新创造;“两个结合”的特质是秉持开放包容,启迪我们要以历史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开阔的胸襟对待外来文化,努力破解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些蕴藏在“两个结合”中的思想原则和方式方法,相互交融、相互支撑,共同形成文化创新的科学原则。新时代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提供的思想遵循,坚持“两个结合”开辟的文化道路,才能不断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增强了文化自信的深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

“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持久的精神动力与强大的思想保障。

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传承弘扬。“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基础上的“双向奔赴”,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独放异彩,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正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的有机统一,巩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而这一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又反过来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特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使得我们能够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隋唐时期国家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融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加强。作为唐朝统治中心的关东地区成为多民族文化聚集的场所、多民族成员共居之地,整个中国大地成为民族融合的家。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部分族群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已经凝结为一个牢固的整体。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有36人,约占1/10。唐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当时的文化繁荣、开放进步与民族的大融合密切相关。

元朝建立后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传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久居中原,深深地认识到了“汉法”的重要性,并推行“汉法”。可见,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但在文化上却与历代中央政权一脉相承。

清朝建立后,朝廷非常重视边疆地区的事务,在中央设立以管理蒙藏事务为主的理藩院。鸦片战争后,清朝积贫积弱,中国处于西方列强宰割的地位。也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从民族自在走向了民族自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之后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继而得出结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唤起国人民族意识,推动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启蒙作用。

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新阐释。

作者:唐洲雁、刘本森,均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据《光明日报》)

□ 程晓宇

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应当履行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自觉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年轻干部只有不断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才能做到无论遇到何种诱惑、何种困难,都不迷失方向、不丧失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要求党员对党忠诚老实,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决定的。党的先进性使党员自觉忠诚于党、时刻追随党;党的纯洁性要求党员必须在思想上是坚定的、在信仰上是纯粹的,在行动上体现出来就是忠诚老实。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立有“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眼。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的誓言,与敌人顽强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解放战争时期,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种种酷刑折磨,宁死不屈,用鲜血诠释了“永远朝着东方,永远朝着党”的忠诚。人们常常以“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来赞誉优秀共产党员,这种“特殊材料”正是用忠诚和信仰淬炼而成的。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能不能始终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衡量是否对党忠诚老实,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和平年代也有明确的检验标准,首先就是要政治过硬。习近平总书记

记强调:“在千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根基打得牢不牢,直接影响年轻干部的成长成才。年轻干部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

党的纪律和规矩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忠诚老实的“试金石”。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年轻干部要以身作则守纪律、讲规矩,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始终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特别是要慎独慎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对这些硬杠杠、铁规矩,年轻干部要切实增强执行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把对党忠诚老实转化为知行知止、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

忠诚老实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新征程上,如何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如何更好解决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一道道考题摆在面前,如果在工作上不愿担当、拈轻怕重,遇到困难就退缩,就难以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年轻干部要顺应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要求,把崇尚实干、埋头苦干作为对党忠诚老实的一份承诺,作为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一种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执着奉献真抓实干,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老实。

(据《人民日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

□ 新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密切交往过程中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交融,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新疆地区也是如此。今天的新疆仍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只有民族团结,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保证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才能给各族群众带来更多的福祉。

「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历史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往往涉及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我们从历史中来,它是我们存在的依据和理由,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和甘露。

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名称,即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各族和文化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的华夏族群,经过长期与周围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别是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大动荡的交汇与融合,至秦汉之际,进一步与周围族群融合为一体,形成以中原人口居多的汉族,并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主体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大迁徙,出现了大融合的局面。这个时期,中原地区陷入割据状态,其中势力比较大的割据政权,或进入中原,或雄踞一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胡十六国”。在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有“胡人改汉姓”的记载,同时杂居民族间的通婚很普遍,而且在社会上层也时有发生。

隋唐时期国家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融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加强。作为唐朝统治中心的关东地区成为多民族文化聚集的场所、多民族成员共居之地,整个中国大地成为民族融合的家。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部分族群逐渐消失在历史舞台,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已经凝结为一个牢固的整体。有人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有36人,约占1/10。唐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当时的文化繁荣、开放进步与民族的大融合密切相关。

元朝建立后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传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久居中原,深深地认识到了“汉法”的重要性,并推行“汉法”。可见,元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所建,但在文化上却与历代中央政权一脉相承。

清朝建立后,朝廷非常重视边疆地区的事务,在中央设立以管理蒙藏事务为主的理藩院。鸦片战争后,清朝积贫积弱,中国处于西方列强宰割的地位。也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从民族自在走向了民族自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之后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继而得出结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在唤起国人民族意识,推动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启蒙作用。

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新阐释。

毛泽东同志的阐释,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客观把握。

「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历史融合」

新疆地区的各族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哈密七角井考古发掘的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大量海贝,有力证明早在史前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了联系和相互影响。

汉朝统一西域之后,西域诸族为取信于汉王朝,以求得保护,多将子弟送至长安或洛阳。西域诸族侍子中原地地熟悉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制度,培养了他们对中央王朝的感情,了解并倾慕于中原地区发达的文明,同时对汉朝也产生了亲近感。

新疆汉晋时期的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发现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聚居的遗迹。罗布泊南古城遗址是晋代西域长史驻地,尼雅遗址出土一枚“司禾府印”。在这两个地区既发现反映汉人生活的简牍,又发现其他民族留下的佉卢文材料和文物。在佉卢文材料中,有直接反映当地汉人和其他族群友好相处的例子。

1926年,河南省洛阳市出土了北魏《于阗王墓志》,志文中的“西城守阗国公主”,就是西域于阗的公主,该墓志记载一起典型的西域人与中原人通婚的例子。不同族群间通婚促进了互相融合与认同,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隋唐时期政治上长期统一,西域地区的各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处于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过着共同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方面也互相交融,由此产生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大大增强了作为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密切交往过程中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交融,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今天的新疆仍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新时代,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新疆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族人民互相信任、团结合作,奋发图强,才呈现出繁荣发展稳定的崭新局面。只有民族团结,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保证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才能给各族群众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执笔: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据《新疆日报》)